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周月峰
编

杜亚泉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周月峰
编

杜亚泉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周月峰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300-18723-5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杜亚泉 (1873~1933)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66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杜亚泉卷

周月峰 编

Du Yaqu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6.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89 000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从晚清、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时代潮流，其变化都可说是翻天覆地。杜亚泉身历其中，个人命运随着这“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而沉浮，也在观察与思考着这过渡时代，同时构想着未来。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却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①杜氏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影响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没无闻了”^②。上世纪90年代后，思想界逐渐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过，杜氏言行与时代风气互动互竞的一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仓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号亚泉，后以号行。他曾对蔡元培解释“亚泉”二字之含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③

杜亚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时曾勤于科举，治帖括、训诂。在有清一

① 参见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读到杜亚泉的资料时感叹“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卷，《日记》，193页，1993年8月4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正是“失语”的最好诠释。

③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代，绍兴山阴县科举之风浓厚。杜姓为山阴望族，祖上屡有举人、进士出身者。杜亚泉的父亲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事实上，杜亚泉幼时对于举业也确实能“恒自奋勉”。我们不应因为后来杜氏不再参加科举，而忽略了他曾追随科举的读书脉络。^①

蔡元培后来这样记录杜亚泉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

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夙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②

当时读书人在考中秀才之前，一般都是学“制艺”，如长杜亚泉五岁的同乡蔡元培“十二岁而学为制艺，汨没者六七年”，在十七岁考中秀才后“乃迁于词章”^③。稍后，杜亚泉第一次乡试落榜，乃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秀才重文采，考举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时需讲求学问。此次乡试落榜，杜亚泉大概意识到自己学问不足，“以帖括为不足业”。于是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尤肆力于许氏之学，罗致群书”^④。从帖括到治训诂考据的转变，在参加完童生试成为秀才的读书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才后先“迁于词章”，两年后“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故训之学”^⑤。又如与杜亚泉同一年出生的梁启超，也是在考中秀才后先治帖括，治帖括一两年后“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⑥。我们可以看到，杜亚泉上述治学的转变，与同一时期的蔡、梁两人类似，读书、治学虽有变化，却仍在传统之内变。或可以说，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

① 后来与杜亚泉共事的胡愈之便说杜“先生无意科名，幼年专攻数理化博物”（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杜亚泉之子杜其在也回忆说其父在变法图强热潮的影响下，“毅然抛弃科举学业，改学西方科学技术”（杜其在：《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42页）。

②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③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

④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

⑤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

⑥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个科举制下传统的读书人。

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①。杜亚泉也是在次年秋听到战耗后，“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汨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②。至此，杜亚泉虽对考据词章、科举有所不满，但似乎也并未毅然决然放弃科举，而是再一次调整了治学方向，改治筹人术。

自阮元编撰《筹人传》之后，天文历算已为治考据者所关注。杜亚泉的业师杜山佳本治训诂，但此时也在“治中算，习天元”^③，另一位与杜山佳为同科举人的何寿章也“治筹人家言”，并著有《圆锥曲线论心》一卷^④。两人都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均为杜亚泉所熟识，并一同应举。他们当时同治中算，对杜亚泉治学方向的转变当有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最先指导杜氏治筹人术的也确实是曾指导他治训诂的杜山佳。

另一方面，杜亚泉这次治学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甲午前后，时代风气已经大变，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与杜亚泉相识的钱塘士子叶瀚后来回忆，他在年轻时所读多为西学，重西文、数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岁（1884年）时，“新会潘学使衍桐为浙江学使，命题云《〈海国图志〉纠谬》。阅生作，诧而奇才，拔置第一。于是杭人士始知新学讲求之有益，闻风而起者大有人矣”^⑤。这种风气未必始于叶瀚，但学使命题的改变造成当时学风的变化，大致属实。几年之后（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⑥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

② 杜亚泉：《〈定性分析〉后记》。已收入本书。

③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

④ 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人物列传》，3165页，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9。

⑤ 叶瀚：《块余生自纪》上，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⑥ 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杜亚泉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改为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①。他在这两年间研习数学精进迅速，到1898年时，学使按临，考算学，他已是闾郡第一。精于数学后，又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并治哲学，通日语。他个人这一连串的治学转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于追随科举而变，从训诂到筹人术，由筹人术到西方算学，再由西方算学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直至放弃科举。杜亚泉后来也说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他才“知国难将作，绝意仕进”^②。也正是在这时，他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以教书立身、用世。

二

甲午后两年，何寿章与徐树兰在绍兴办中西学堂，聘杜亚泉为算学教习。这很可能是何寿章与杜山佳、杜亚泉熟识，了解杜亚泉在这两年中算学精进。自此，他才开始以算学闻名于绍兴，并以算学谋生，在绍兴古城中，成了一个新人物。在学堂中，杜亚泉结识了后来影响其人生轨迹的蔡元培。

1898年冬，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学堂总理。杜亚泉始与蔡元培相识。蔡元培1884年十七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1892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便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1898年九月受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返回绍兴，任职中西学堂。与杜亚泉相比，蔡元培显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国家层面时局与时代风气的转变，且深受其影响。蔡元培回到绍兴，无疑影响了绍兴小环境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

在结识蔡元培后，杜亚泉与之来往密切，一起学日文、英文，共同编和韵记号。其中，中西学堂开设日语课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张，并由他引进日语教师。因此杜氏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在他们学习日语后，同读“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都对传统学说“不免有所怀疑”^③，思想逐渐趋同。

①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② 杜亚泉：《智识阶级之团结》。已收入本书。

③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页。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中西学堂，将绍兴的精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蔡元培曾说当时教员中马用锡、薛炳、马纲章、杜亚泉、寿孝天等，在当时的绍兴，“极一时之选”^①。这种群体氛围的存在，当对杜亚泉有不小触动。

在这样的交往与氛围中，杜亚泉的思想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到第二年，他曾向蔡元培提议“兴一蒙学会，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先于府城开一学堂，会中人为教习，并立师范生数人，教学生二十余人，即以所编之书授之，借以知其善否，随时改定，俟部类略备，风气渐开，乃推之乡镇”。对杜氏建议，徐树兰听后“愿任刻书之资”。当时设计的课程有：初学惟识字、故事、公理三门，附以体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读经、阅史、舆图、数学、格致，皆由浅入深，大约以三年为限。当时拟编初学书，计划由蔡元培任识字书、马用锡任故事书、杜亚泉任公理书编撰。^②

组学会，开学堂，特别是以蒙学为名，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趋新士人多从事于此。当时蔡元培、杜亚泉的旧交叶瀚曾在上海创办《蒙学报》，在蔡元培、杜亚泉等阅读的报刊中，《蒙学报》便是较为固定的一种。正因蔡元培已将这一群体结合在一起，故杜氏才会有“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的提议。也因他与蔡在这一时期关系密切，思想趋同，故同被认为是“新派”，在“旧派”的反对下，一起离校。后来蔡元培回忆当时学校中新旧之争的情形：

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菴、何阆仙诸君亦多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齟齬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③

遭“旧派”反对固然使杜亚泉失去了这一教席，但在当时趋新尊西的时风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员，也是一种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通过科举实现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说，从1898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几

①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页。

②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05页，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③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年中，蔡元培在杜亚泉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在这几年中，杜亚泉事业上每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向蔡元培咨询，甚至求助。比如，杜亚泉于1902年受邀主持南浔浔溪公学，杜在赴任之前向蔡咨询；在任上出现学潮时，也向蔡求援，蔡从上海“特往南浔调停”。^① 杜亚泉要创办事业时，也往往首先邀请蔡元培加入。如在创办《普通学报》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并“属元培任经学门”^②。

也正是通过蔡元培，杜亚泉得以结识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张元济等人，并于1904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于1902年，由张元济推荐蔡元培兼任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生，蔡即避地离开上海。1903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又依蔡子民的推荐，聘他的同乡人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③ 如果说，绍兴的算学教习仍是一个地方性人物，那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理化数学部，特别是之后主政《东方杂志》，则显然已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人物。

三

清末数年，中国政治、社会变动极大，朝野空气也随之活泛。1905年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此后立宪的推进其实已相当快速，但仍未能赶上民间对宪政推行的期盼。当时民间士绅纷纷组社团，办杂志，进京请愿，要求加快立宪。

时局也牵动着杜亚泉。事实上，他进商务印书馆后，对时局非常关注，也热心于社会事务。1907年，他与张元济等创立浙江旅沪学会，被选为评议员；1908年参与江、浙两省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出卖苏沪及沪杭两铁路修筑权的风潮，对于路事，极尽心力；在1909年浙江旅沪学会开会时，杜亚泉做题为“现值预备立宪时代当先研究宪政”的

^①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96页，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② 《蔡元培日记》（上），80页，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③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07～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演说^①。

这样的时代风气也影响到了商务印书馆。1908年，时在日本考察的张元济从报上看到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九年清单的报道，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同人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希望国内同志不要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并建议立刻着手编译政法书籍。^②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对自己的出版事业做了重大的调整，同时，对《东方杂志》也进行相应改革。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1908年七月以前的编者为徐珂。^③或正因时局的转变，选报不足以担当“国民之向导”的责任，故从七月开始，《东方杂志》改由更精通政法、热心时事的孟森主编。但孟森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不到一年，便因当选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无暇撰述，辞去主编。杜亚泉大致从这时起，开始参与杂志编辑。杜氏在数月前刚与孟森合作笺释《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由杜亚泉接替孟森主掌《东方杂志》合情合理。

杜亚泉于1909年初入主《东方杂志》。到1910年4月，《东方杂志》在第7卷第2期（1910年3月）刊出《改良序例》，重申“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的办刊宗旨，并以各种新栏目配合“宪政方新，世变益亟”的现状。又一年后，更在第8卷第1期（1911年3月）宣示了“本社之大改良”，表示随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近，社会上一切事物，皆有亟亟改进之观”。《东方杂志》也从内容到体例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回应“随世运而俱进”的读者。或可以说，杜亚泉时代的《东方杂志》，就是与清末宪政偕行的。而他对于清季新政的认知，却比很多时人更深刻。^④在稍后，他又经历辛亥革命与随后的尝试共和。正因他要随时“为国民之向导”及“对政府而尽其忠告”，他的言论多有所为而发，有具体的针对，为我们留

① 参见《浙江旅沪学会开会纪事》，见《申报》，1909年3月29日第20版。

② 参见《张元济致高凤谦、陶葆霖、杜亚泉》，见《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133页，1908年八月初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③ 参见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11～112页。

④ 关于杜亚泉在辛亥前后对时局的洞察，可参见罗志田：《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代序）》，见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下了不少对“当前一境”的即时观察及批评建议。

四

在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曾用“伧父”或“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或译著三百余篇。在杜氏主持之下，《东方杂志》成为当时国内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杂志。章锡琛评价：“《东方杂志》之有今日，君之力也。”胡愈之亦坦言：“《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①在这一时期，杜氏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杂志事，甚至在1917年时曾向张元济建议将编译所理化数学部委托其他人，自己专力主编杂志。^②但当时新文化运动渐起，时代风气再次改变，杜亚泉渐渐因其不那么激进的主张，成为一个“不新不旧”的“落伍者”。

民初在对尝试共和挫败的反思中，时人的关注点有一从政治热到文化热的转向。但很快不满渐生，从1913年开始，有一迷茫徘徊时期。此时，杜亚泉已开始对此前国人所追慕的“西方”政治有所反思，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多称为“欧战”）爆发之后，此种反思进而扩大到东西方文明全体，并使他卷入东西文明论争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是步步深入模仿西洋，大致从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西洋文化精神。正如杜亚泉所说：“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使得很多时人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④。如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凡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此后“新时代行将发生”^⑤。陈独秀认为受此次战争之洗礼，1916年以后欧洲的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⑥。他们认

① 章锡琛：《杜亚泉传略》，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6～17页；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2页。

②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225页，1917年7月2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③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已收入本书。

④ 平佚：《中西文明之评判》，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81页。

⑤ 梁启超：《欧战蠡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2页。

⑥ 陈独秀：《一九一六》，见陈独秀著，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一），197、1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